

岁末怀故人



孙逊



吴福辉



戴小京



姜寻

按惯例，临近除夕，我都会发信问候国内外亲朋好友。去年2月4日下午，当我开始用电邮或微信发送贺年卡时，突然意识到，有七个地址/号码已经无法送达，当即心情黯然。而这，还不包括我已撰文怀念的汉学家瓦格纳和著名诗人杨牧（参见《瓦格纳：为学术的一生》，2020年3月13日《文汇报》；《一次致敬式的对话》，《告诉我，甚么叫做记忆：想念杨牧》，台北：时报出版，2020年9月）。

依旧是岁月匆匆，不断有师友隐入历史深处。因疫情缘故，这两年取消了告别仪式，以往那种刻骨铭心的“伤逝”场面，逐渐被网络上众声喧哗的“坏人”文/图所取代。如此转化，不知不觉中，悲伤的意味减少，而无奈/无力感则陡然升高。我明显感觉到，那些对我等凡人十分重要的“记忆”，正从手指缝中溜走，悄无声息。

今年春节来得早，今天就开始筹备发送贺年卡了。此前看过2021年12月22日《中华读书报》的《2021永远的怀念》，35位去世的人物中，竟然有11位是我比较熟悉或有一面之缘的。我不擅长即兴写作，而且相信鲁迅的说法，感情正烈的时候不适合写诗；但我关注各类怀念文章。读来读去，凡有很多好文的（如沈昌文、王信），我深刻认同，就此搁笔；而声望如日中天、去世后媒体上铺天盖地追怀的（如余英时、李泽厚），我虽私下感念，因关系没到那个份上，谢绝撰文，怕说多了有攀附的嫌疑。

倒是以下四位先生——2020年12月11日去世的孙逊先生、2021年1月15日去世的吴福辉先生、2022年1月4日去世的戴小京先生，以及2022年1月16日去世的姜寻先生，年龄悬殊，专业背景不同，贡献及名气也有大小，跟我的关系更是很不一样，但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考虑到四位的业绩及人品，都有各自单位、亲友或弟子专门介绍，这里就说说我与他们的交往，琐碎碎碎中，或许也能见其真性情。

二

忘记是哪一年初次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孙逊（1944—2020），但首次合作始于1997年，则很明确。大概是外出游玩其乐无穷，懒得写日记了，如今只留下9月25日赴上海，10月5日由南京返京的线索/印记。南京只是稍作停留，就为了拜访程千帆先生，这在《掬水集》小引中提到了。主要部分是在上海师大，记得是集中讲义，讲什么也忘记了，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唯一记得的是，人高马大的孙逊教授竟然心细如发，刚讲了一课，就很体贴地问我：“这次单独外出，是不是得给夏老师买点礼物？别的就不要了，弄几块古玉如何？君子佩玉，很适合夏老师气质的。与其带回几十块钱讲课费，还不如奉上几块古玉。你说呢？”

看我点头称是，孙教授马上趁热打铁：“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上海市文物商店，已经替你看好三块明清古玉，质地不算很好，略有残缺，但都经过专家掌眼，有鉴定证书。价钱呢，已跟店里谈妥了，就用你的讲课费。”

此前我曾在新疆买过假的和田玉，被妻子严重警告：不要不懂装懂，别乱买东西了。这回有孙逊紧急补课，普及收藏诀窍以及玉石的基本知识，再加上出自文物商店，不会离谱的。回家拿出一周劳动所得，果然大获表扬。直到今天，这三块不算珍贵的古玉，还时常陪伴我们外出游览。

以后交往多了，才知道孙逊不仅是著名学者，还是个颇有经验的收藏家。据说最初上手时，瓷器、玉石、印章等什么都收，有些杂乱，后来才逐渐集中到明清文人字画。因宋元字画太贵，明清还勉强跟得上，而且不求多，求贴近自己的专业。

在《收藏结合自己的专业最开心》（2015年3月3日《文汇报》）中，孙逊称：“如果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能有机会收藏到他们之中一部分作品，哪怕是很少一部分，那该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把它们集在一起，岂不就是一部可以摸到古人脉搏跳动、感觉到古人体温的明清文学史！”据说他在上海师大教中国文学史课，讲到明清段，每个重要作家都能秀出点宝贝来。无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如此古今对照，直接触摸历史，当然是大有裨益。

对他的藏品，惊鸿一瞥后，我不再过问。不是不信任，而是怕被诱惑。我知道这里的水很



孙逊



吴福辉



戴小京



姜寻

深，一旦介入，需要金钱，更需要时间。我没有这个财力与定力，只好眼不见心不烦。但若处理得好，拿得起放得下，那确实有利于养成本学识与性情。我的北大同事潘建国教授是孙逊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曾撰《无言之美——纪念恩师孙逊教授》，讲述孙逊收藏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书扇合册，借此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刻。“后来，他请苏州老裱工重新精裱了册页，请沪上著名画家刘旦宅题签‘容若梁汾书扇合册’，又特意来到北京，请冯其庸先生、袁行霈先生分别题写了引首‘词坛双璧’‘千古高义’。”

我所接触的孙逊，主要是其学术策划与组织方面的才能。至于他论《红楼梦》及东亚汉文小说方面的著作，自有专家评说。1996年，上海师大成立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四个单位的人文学院，孙逊任首任院长。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申报博士点，争取重点学科，延揽杰出人才，拓展研究领域，乃至推荐新人获奖等，这些琐细而艰辛的工作，需要有高屋建瓴且大公无私的人来认真规划与推动。

十三年的人文学院院长任上，我看着能屈能伸、不卑不亢的孙教授不断进取。近年上海师大文科实力的增长以及声誉的提升，应该说与孙逊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卸任院长后，他又主持或参与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等成功运作。直到重病缠身，他仍关注上海师大人文学科的发展，竭尽全力扶持年轻学者。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发微信，还在谈这个话题。

因妻子夏晓虹退休后受聘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我连续几年到上海师大做讲座，2016年12月5日讲《大变动时代的图像叙事——晚清画报三十年（1884—1913）》、2017年4月24日讲《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2018年3月26日讲《声音的政治——现代中国的宣传与文章》、2019年3月19日讲《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前三次都是孙逊亲自主持并做精彩点评，最后一次，他用嘶哑的声音简单开了个头，就请宋莉华代为主持。看他身体实在太虚弱，我给他发微信：“孙老师，今天天气不好，请在家休息，不用出席夏晓虹讲座。”他的回复是：“谢谢！我今天上午在家休息，中午11点半仍来陪你们外宾用餐。”我相信，很多学者之所以乐意与上海师大合作，与孙逊教授这种谦恭与体贴的性格大有关系。

三

今年的1月15日，我在朋友圈贴出三张照片，还有下面这段话：“去年今日，接到吴福辉在加拿大去世的消息，我赶紧告知几位师兄师姐，略为商议，发去唁电：‘惊悉老同学吴福辉不幸病逝，我们都深感悲痛！请夫人珩青节哀顺变，保重身体！钱理群、赵园、温儒敏、凌宇、陈平原。’前四位确实是老吴的同学，我属于师弟，但经常在一起活动。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我之所以一到北京就如鱼得水，除了导师的福荫，还得益于这些学问及人品都很好的师兄师姐们的提携。钱理群抱怨，知道老吴要去加拿大，可走前为什么不专门道别呢？我说不对的，2019年9月3日给三位寿星祝寿，9月9日欢迎日本朋友聚会，老吴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只是离愁别绪，让你人家怎么说？而且并非一去不复返，日后还有的是见面机会。可找出那几张照片，仔细观察，老吴招牌式的微笑中，不无几分哀怨。怀念远去的师兄！”

我的师兄吴福辉（1939—2021）是中国

现代文学馆最早的筹建者之一，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身份，对他来说更重要，那就是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当年河南大学与现代文学馆联手申请博士点，对双方都是一大利好。此前，老吴曾多次对我说：“你们在大学教书，真幸福！”因为，考上北大研究生前，老吴当过多年中学语文老师、教导主任，教书在他是本色当行，也是兴致所在。这几年我与河大文学院接触较多，那里的老师谈起我的师兄，莫不交口称赞。老吴去年1月在加拿大去世，8月河大文学院举办了“吴福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又有“吴福辉先生追思会暨《吴福辉先生纪念文集》发布会”，这都在情理之中。

老吴学问做得最好的，是海派文化论述（如《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而非早期的讽刺文学研究（如《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但我在中山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1984），明显是受他《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的影响。见面时谈及这点，他很得意。三十多年间，作为师兄，老吴对我倍加关照，只是因学术风格及生活品味不太一样，平时交往并不频繁。

2019年9月的两次聚会，第一次是学生操持，第二次才是我发起。老吴很开心，和夫人朱珩青一起参加，回去后还发来他的照片，嘱咐我转给各位。那两次活动确实没提及移居异国，他不想多说，我们也不便多问。多年的老朋友了，相互间达成默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尊重别人的选择。因微信联系很方便，久而久之，我竟忘记了他已人在异国，2020年4月30日给他发信：“制作一册《手稿集》，若有兴趣，请发来接收地址及手机。”他当即回复：“手稿集可以考虑。但我现在人住在加拿大儿子这里，因疫情今春按计划回国已不可能。那就再联系，有关事宜可在微信上谈的，也可先交流一下。”过一会又来信：“平原，如你所说待回国时再议吧。国内疫情好转，加幸亏边境封锁早，与美切割成功。目前高峰还未至，但确诊病例每日总算稳定。我是坚不出门，和儿子本来就是分开住的，所以平安无事。你和晓虹多多保重！”

各自都忙着防疫，日子过得很快。2020年5月27日晚上23:56，老吴发来《百年翩跹》，那是他几年前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散文，当时读过我就点赞了。这回估计是“文汇报”微信推送，他马上转给我，显然希望我重读。此文提及他们家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从甬入沪算起，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计30年；从上海到东北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也是30年；再由1980年代至今整整40年；正逢一百年！”而他自己，更是在回顾家族史的同时，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挖掘了海派文学，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情结’，调动起童年的记忆，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我从学术专业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老钱、赵园和我都认定，老吴研究海派文化，之所以让我们望尘莫及，不是因为他勤奋，而是他带着寻根的深情，故能格外体贴入微。

四

今年1月4日晚上，看到我的大学同学、上

布阵上的疏漏：虽然朝汉城方向大举进攻的西线美军第一军和第九军并肩突击没有空隙，但东线的美军第十军与南朝鲜第三军团之间则有兵力薄弱环节，这无疑是志愿军的机会。彭德怀由此确定“西顶东反”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组织西线坚守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集团；而在东线则有计划地后退，待敌人一部态势突出时，集中主力相机反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邓华、韩先楚，两位曾经携手挥师解放海南岛的年轻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

这一时期，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海空兵力已达13万，作战飞机超过1100架。从1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遮天蔽日，雨一样密集的炸弹、燃烧弹把每一个黑夜都变成了白昼。这让擅夜战近战的志愿军的作战优势大打折扣。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西线，韩先楚指挥的阻击战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大“王牌”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1951年2月6日才勉强完成……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

1951年2月5日，除夕之夜。“联合国

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戴小京先生（1952—2022）因病去世的消息，着实大吃一惊。因为，不久前还有工作联系——虽说是拐了个弯。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2月13日，我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王培楠来信，说为纪念毕业40周年，他想将一直珍藏的全套《红豆》杂志7本以及一册《这一代》，还有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送给中大校史馆，特意拟了段说明文字，希望我抄写，以便在馆史馆展出。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刊物《红豆》及钟楼文学社，主编苏炜多次撰文，我也在《怀想中大》（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中有所涉及。王培楠当年是钟楼文学社社长，此文学社的主要工作就是主办《红豆》杂志，而我则是《红豆》负责文学评论的编委。去年我在广州办“大字书”书法展，他和好几位老同学专门跑来助阵，缘于此，才有让我抄写说明的动议。

培楠的简要说明写得很好，但让我抄写明显不合适。因那是给校史馆展览用的，纸张不能太大，而我们班同学中，小楷写得最好的，当属上海的戴小京。当年在中大念书时，他常向容庚、商承祚请教，且坚持每天练习，是我们同学中书法功力最为深厚的。2017年12月，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母校聚会，纪念恢复高考以及入学四十周年，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小京把我叫到一边，略为交谈后，塞给我一把扇子，说这里多，回去再打开。这是一把洒金折扇，上有小楷书写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真是漂亮。念及此，我建议培楠找戴兄抄写这段说明文字。

培楠一听，拍案叫绝，因他手头正好有一张老照片，证明小京也是《红豆》重要一员：“从照片留下‘红豆编辑部同人合影’字样，显然这不是随意抓拍，而是一次有意义的合影。从合影人员构成看，这明显又是《红豆》负责日常编务的核心工作班子。当中有七七级五人（陈平原、苏炜、毛铁、戴小京、王培楠）。七八级（刘浩、辛磊）。九级（罗昌松）。还有两位，当中应有七九八〇级，是编辑部联系当时四个年级的负责人。从时间看，1981年10月22日，显然又是我们毕业前夕了。我想这次把这张照片一同送归学校，您看呢？戴小京已答应抄写说明，我等他寄来。我想，您是位大学者，又是《红豆》核心亲历者，能一同给母校留个‘大字书’的墨宝吗？这样，校史馆若开个《红豆》小展柜，阵营就不那么单薄了。”

我辞谢了赠送母校书法作品的建议，因同学中擅长此道的很多，轮不到我出头。12月22日王培楠又来信：“平原兄好！小京的墨宝已寄到。校史馆说，没有收藏您的《怀想中大》。这次，是否可给他们送些书？”中大图书馆藏有我不少著作，校史馆因刚从图书馆独立出来，藏品及展品稀缺，号召校友们多多捐赠，此前我并不知情。赶紧挑出若干近著，连同《怀想中大》，寄给王兄，请他转交中大校史馆。

正欣赏着小京抄写的《红豆》说明文字，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惊诧之余，我当即给培楠去信：“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十几天前，你发来他抄写的向中大校史馆赠送《红豆》的那则短文，看不出任何病态，怎么会突然去世了。大概，同学年纪渐大，此类事越来越多，不胜悲伤。最难得的是你请戴小京抄写关于《红豆》的说明文字，如今竟成绝笔。”培楠回复，已将所有图书连同小京的书法交给了中大校史馆，小京那份捐赠证书日期为2021年12月

月2日，春节前四天，志愿军用电台与当面之敌联系，让对方运走躺满了阵地前的“联合国军”伤员和士兵尸体。美军战地记者记载：“直升机群来来回回运了整整一个上午。”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远离祖国，远程征战。比战场局面更危急的是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存危机。彭德怀后来回忆：“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

还在第三次战役期间，朝鲜方面倾其所能，也仅仅筹措到了9吨粮食。临近春节，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进攻和狂轰滥炸，志愿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我军情况：子弹药弹粮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五斤，须2月6日才勉强完成……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

1951年2月5日，除夕之夜。“联合国

军”发动的“霹雳作战”已经持续了10个昼夜。大雪茫茫，前沿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没有过年的饺子和爆竹，有的只是冻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和敌人一波接一波猛烈的进攻。此时此刻，支撑几十万大军勇敢战斗的力量，是坚韧的毅力和进发的意志，还有深埋在心底的“祖国”两字。

那个春节，中国的大街小巷不时飘出淡淡的香味，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在为朝鲜前线的官兵赶制“炒面”。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加入了这支特殊的拥军方阵之中。2月11日，大年初六。邓华指挥的东线志愿军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傍晚时分，中朝军队趁着早到的夜幕，突然向态势突出之敌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横城反击战。至13日凌晨战斗结束，志愿军歼敌1.2万人，缴获各种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种枪6200余支、坦克7辆、汽车550辆，迫使东线“联合国军”后撤26公里，重挫了敌人举反扑的锋芒。这一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这一天，是当年的谷雨。“雨生百谷”——新中国第二个春天的播种季节，到了。

五

我与前三位故人，交往不见得都很密切，但起码认识二三十年。而结识模范书局创始人、诗人、雕版收藏家姜寻（1970—2022），只有短短两年时间，而且还是在疫情期间。可想而知，我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只是因他去世太过突然，“是库房搬书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我觉得非记下几笔不可。

2019年年底，北京电视台编导王宇制作《我是规划师》第一集，约我客串出镜，在永定门、正阳门等处现场，念了几段我《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中的文字。这种现场表演，非我所长与所愿，但为了老北京，我还是勉为其难了。没想到2020年1月8日又接到王导来电，说还要补拍些我在城南的镜头，地点就选在杨梅竹斜街的模范书局。看我很不情愿，对方极力劝说，作为拍摄点，那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的地方，而且主人很有趣，相信你去了会喜欢的。

那是个冬日的上午，风很大，天气很冷，但随摄制组走进书店，确有温暖如春的感觉。书店不大，略显拥挤，稍有顾客，就转不过身来，但氛围很好，尤其是那几部主人制作的雕版诗集，难得的兼及技术、审美与岁月沧桑。姜寻把我们领到二楼的书房，看他的收藏，签了若干他收藏的我的著作，聊了聊各自的文学观，以及对雕版印刷的感觉。谈得很开心，几乎把拍摄的事忘了。不知不觉中，太阳照进阁楼，站在窗前，俯瞰旁边的平房，老北平的韵味一下子上来了。看我赞叹不已，姜寻赶紧推荐自家在西城区什刹胡同的“模范书局+诗空间”，说比这更有味道。那里原本是中华圣公会教堂，始建于1907年，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被他改造成书店，成了文青打卡的最佳去处。当时一拍即合，就在那里举行我的新书发布会。

几天后我去信：“姜寻兄，那天谈及在模范书局空间开我的《想象都市》等四本新书发布的可能性，承蒙你一口答应。可三联认为放在他们刚重新开业的韬奋图书馆中心更合适。得便再向你请教版刻及装帧问题。”接下来，我们围绕三联图书及其装帧等，略为交流了一下各自的心得。